

歐戰爆發後中美經濟交往的關係網： 兼論「美國亞洲協會」的主張

吳翎君*

歐戰時期中國對外經濟關係整體不佳的情況下，中美進出口貿易卻能脫穎而出，且美國在華投資大為成長，成為近代中美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階段。此與中美兩國的經濟活動、技術引進和人才交流所形成的關係，環環相扣。諸如美國大學俱樂部、美國在華商會、中美工程師協會等組織，而其中商人團體的「美國亞洲協會」因發行有固定期刊，最能反映美商在華的主張及其作用。

本文探討一次世界大戰對美國在中國市場的發展提供怎樣的契機？特別著重中美商人、企業及利益團體在經貿活動與技術引進方面的聯繫互動，這些關係網絡如何成為一戰時期中美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力，並由此造就一戰以後到1930年代中美經濟關係發展巔峰的一個轉捩起點。

關鍵詞：中美關係、中國與一次大戰、美國亞洲協會、美商在中國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聯絡地址：97401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1號東華大學歷史學系(No. 1, Sec. 2, University Road, Shoufeng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97401, Taiwan [R.O.C.])。

一、前言

一次大戰的爆發，在近代中美經濟交往關係有著特殊的意義。大戰初期，美國屬中立國家，他們急欲趁此機會，轉移在歐洲的資金，並拓展遠東及中國市場。一戰時期美國在華商會一再呼籲美國應趁此一機會通過貿易和投資引進西方的技術革新成果，促進中國的實業建設並藉此提高美國對華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大戰時期中國確曾想利用大戰時期歐洲勢力在華的消退，向中國相對友善的美國，引進其技術來發展中國的實業。高家龍的《大公司與關係網》(*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一書中以兩家西方公司、一家日本公司和三家中國企業，分析和比較他們在中國的關係網。高家龍的重點在於西方跨國企業與其在中國的競爭對手之間的相互影響，尤著重於西方公司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業務管理和中國社會關係網絡的關係，這些西方企業如何因應中國根深蒂固的社會關係網以及對中國社會網絡中的家族和家鄉基礎的聯繫採取怎樣的策略？¹本文中使用的「關係網」(networks)，係指在中美經濟交往中，中美兩國的企業主、商人及其利益團體(或組織)所形成的關係網。

一次大戰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總體戰(Total War)，中國與美國最初都屬於未參戰國，但亦同受戰爭的巨大衝擊，而且從兩國的經濟交往關係而言，是正面大於負面的。一次大戰對中美兩國提供一次特殊的機會，使得中美兩國的經濟擴展和互動更加緊密，美國資本和技術被大量引進中國，美商在中國投資各種新興企業和工廠；此外，中美兩國間的各種經濟和社群網絡也紛紛建立起來，他們或吸納華人成員，成為正式組織成員，或推動與華人團體的交往。這樣的關係網絡在一戰以後形成一個多層次的經濟、社會、技術轉讓和知識交流的複合關係網。但過去對於歐戰以後中美經濟關係的研究較少從此一面向切入。筆

¹ Sherman Gilbert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者曾研究民國初年北京政府與美國大企業的中美合作個案，這些個案主要為北京政府的大型公共工程投資案，著重的是美國大企業與兩國政府層次的交往如何帶動近代中國的國際化。²本文則偏重於經濟活動的層面，探討一次世界大戰對美國在中國市場的發展提供怎樣的契機？尤著重於中美商人、企業及相關利益團體在經貿活動與技術引進方面的聯繫作用，從「企業、技術與關係網」論述此一歷史進程。而其中美國在華最具影響力的商人利益團體——美國亞洲協會(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又有怎樣的訴求，這些關係網絡如何成為一戰時期中美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力。由於《美國亞洲協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於1919年由商人團體的機關報改版為文化期刊，因此本文討論下限大抵止於此時。

二、歐戰與中美經濟關係的轉捩點

過去研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美關係的學者，普遍認為1898年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國對華關係的一大轉折，並且形成美國對華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但學者較少關注一次大戰在中美關係上的作用。1914年8月兩件世紀大事，對美國的海外投資發生革命性的影響，同時對中國市場而言，中國亦通過美國加速了中國與國際市場的接軌。一是8月15日，美國開鑿的巴拿馬運河正式通航，縮短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距離，使得如何打開遠東市場的成為重要而迫切的命題。二是，一次世界大戰的「八月砲聲」(Guns of August)轟隆於德、奧匈等同盟國和英、法、俄等協約國之間，歐洲主要國家都捲入了這場戰爭。美國最初未參加大戰，美國資本家醞釀成立「廣益投資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簡稱A.I.C.)，藉機拓展美國在海外市場的影響力，而中國市場正是他們有意移轉部份歐洲資金進入的地區之一。再者，大戰初期中美兩國同屬中立國家，為確保戰時中立國家的對外貿易和航海自由，並避免與捲入歐戰的相關國家在華商人組織之利益有所糾葛，1915年6月19日，美國在華商人在上海成立「美國中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na, 簡稱AmCham)。以上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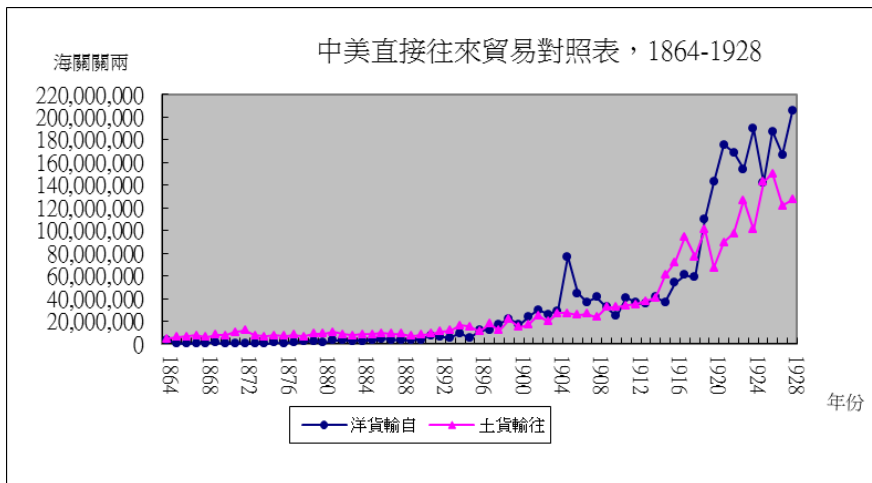
² 詳見吳翎君，《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戰爆發之後中美經濟關係之發展有別於中國與其他主要國家的重要背景。

十九世紀末以前美國對華貿易量占其外貿的比重極其微少。在 1897-1901 年僅有 1.0%，1902-1906 年為 2.0%，此後又下降到 1.0% 左右，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1916-1920)從 1.1% 上升到 1921-1925 年的 2.4%，1926-1930 為 2.3%，到 1931 為 4.0%。³據海關資料「中美直接往來貿易對照表，1864-1928」(表 1)，可以看出不論就洋貨輸自美國或華(土)貨輸往美國的價值，在一次大戰以前數量不大。值得重視的是 1898 年以前華貨輸往美國的價值均高於美貨輸華的價值，1898 年以後才逆轉為美貨輸華價值較高，這也顯示美國對華貿易逐漸起色。一戰期間的 1915-1918 年華(土)貨輸往美國的價值一度回升，超越美貨輸華，然一次大戰結束後的 1919 年美貨輸華價值又重占上風。就在 1919 年，不論美貨輸華或華貨輸美的價值均已突破上億關兩，從數據上說明了中美貿易往來的重大進展，由此可見一次大戰在中美經貿關係上具有樞紐的轉折意義。此後，中美貿易關係穩定成長，到了 1928 年洋貨輸自美國突破 2 億關兩，至於華貨輸往美國，在 1927-28 年則約有 1 億 2 千萬關兩。(表 1)

³ Peter Schran, "The Minor Significance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50-1931," in Ernest R. May & John K. Fairbank, eds.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39-240.

表1：中美直接往來貿易對照表，1864-1928



資料來源：楊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4號(1931)，頁118。

如將一戰時期中美進出口貿易的進展，置於整個中國對外經濟關係中更能突顯歐戰對中美經濟關係的深度影響。海關年度報告提到戰爭發生之初其實中國國際貿易實深受打擊。1915年海關年度報告認為進出口貿易深受歐戰之牽連，中國變更國體或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所引起的政治動盪，都比不上歐戰牽連「如無歐戰，運貨船隻連翩而至。」且由於戰時運輸輪船減少，影響進口。⁴1916年海關報告再次提到「歐戰阻礙，本年殆有甚焉。」同樣提到運貨船少的問題，以及受到歐洲交戰國家的經濟封鎖政策之波及，進口之貨不准轉運別國，影響中國出口。到了1918年歐洲主要戰場淪為焦土，事實上中國貿易亦為之阻塞。加以國內又有軍閥內戰、派系政爭和土匪擾攘等因素，使各種貿易俱受影響。

歐洲戰爭三年以來，舉凡秩序，失其作用，……夫全球之擾攘既如

⁴ 國史館重印，《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臺北：國史館史料處，1982)，民國四年(1915)，第1卷，頁12。「本年貿易情形，雖因日本要求條件(指二十一條要求)，恐與大局有關，商家不敢放膽交易，復因創議變更國體，又恐惹動風潮。有此兩層，則與商務一道，誠有阻礙，但牽及之甚，則在歐戰，如無歐戰，運貨船隻連翩而至。水腳運價並不過昂，則本年進口洋貨逆料必能異常發達。」

此，而國內又有流血之政爭，每見繁榮之都，變為蹂躪之地，瘡痍滿目，不勝其數，加之土匪縱橫，火車間亦不敢駛行，受其害者，實有多處。⁵

從海關報告看來，歐戰時期中外貿易俱受其害，而此時中美貿易卻能脫穎而出，不僅是近代中美經濟關係史的一個轉捩階段，就中外經濟關係史亦是一段相當特殊的時期。海關資料亦可看出一戰期間原本占有中國進出口貿易大宗的英、法、德等國家捲入戰爭，歐洲國家對華貿易銳減(特別是1917年中國對德宣戰中德絕交後，德國在華行號撤退，1918年尚有75間，1919年僅剩2家)，而戰爭初期處於中立的美國，其對華貿易則有增長，在華行號和人數亦隨之快速增加。以美、英、法、德、日而言，大戰時期美國在華行號和人數增加比率快速，從1913到1918年美國在華行號增加1.7倍之多，其總數雖仍不如英、日兩國，更難望日本之項背，但個別的美國在華跨國大企業則大有起色，甚至在中國市場呼風喚雨(見表2)。一戰期間，英法困於歐洲戰爭，對華貿易大量減少。中國對德宣戰後，德僑返國，在滬企業或關或歇。美國和日本資本趁勢而起，在上海進行大批投資。有一資料顯示，美商在上海進出口貿易比重，1913年為13.5%，由1894年的第四位爬升到第二位。戰後的1919年為27.5%，取代英國而獨占鰲頭。⁶

表2：旅華各國人民與行號統計表，1912-1922

年代	(行號／人數)				
	美國人	英國人	法國人	德國人	日本人
1912	133/3,869	592/8,690	107/3,133	276/2,817	733/75,210
1913	131/5,340	590/8,966	106/2,292	296/2,949	1,269/80,219
1914	136/4,365	534/8,914	113/1,864	273/3,013	955/84,948
1915	157/4,716	599/8,641	102/1,649	244/3,740	2,189/101,689
1916	187/5,580	644/9,099	116/2,374	281/3,792	1,858/104,275

⁵ 國史館重印，《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民國七年(1918)，頁19。

⁶ 王垂芳主編，《洋商史，1894-1956》(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111。

1917	216/4,618	655/8,479	127/2,262	132/2,899	2,818/144,492
1918	234/4,766	606/7,953	156/2,580	75/2,651	4,483/159,950
1919	314/6,660	644/13,234	171/4,409	2/1,335	4,878/171,485
1920	409/7,269	679/11,082	180/2,753	9/1,013	4,278/153,918
1921	412/8,230	703/9,298	222/2,453	92/1,255	6,141/144,434
1922	377/9,153	725/11,855	229/2,300	184/1,986	3,940/152,848

資料來源：楊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頁143-148。

美國大企業於一戰時期在中國快速擴張，並成為首批具有近代科層管理的在華跨國公司。例如 1870 年創於紐約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1885 年在上海設立第一家代理公司，1914 年美孚開始設置直銷網由紐約總部直接控制，除了中國上海總部外，香港公司為第二層領導，區域公司則設於天津、漢口、東北等處，並且在各中國條約港口和河岸設立分公司。到了 1919 年，美孚石油公司有六個區域公司，二十家分公司，和五百名經銷商遍布全中國。⁷著名的慎昌洋行也於大戰時期崛起。慎昌洋行的創辦人馬易爾(Vilhelm Meyer)為丹麥人，1902 年來華，初任職上海寶隆洋行(East Asiatic Co., Ltd)，1906 年在上海創辦慎昌洋行，主要進口紡織機、軋綿機等各式機器和零件。1915 年該洋行改組為美國公司，此後慎昌洋行代理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電燈，占有進口燈市場的 60% 優勢。1917 年美國奇異公司的附屬企業——中國奇異愛迪生有限公司(China General Edison Co. Inc.)成立。慎昌洋行除代理奇異公司產品外，在洋樹浦設有慎昌機器工廠，並從事各式進出口業務，至 1920 年代已甚具規模。⁸另外，1902 年在華合併創建的英美煙公司(Britain-American Tobacco, BAT)，靠著大規模資本、先進技術、廉價原料、廣告宣傳、效率管理和經銷網(最初建基於中國買辦制度)等競爭手段，快速滲透中國市場，成為壟斷中國菸草市場的美國大

⁷ 吳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第1章，〈市場經營與銷售〉，頁1-59。

⁸ Christopher Bo Bramsen (白慕申), *Open Doors, Vilhelm Mey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Electric in Chin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95-107. 作者白慕申為慎昌洋行創辦人馬易爾的外孫，曾任丹麥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1995-2001)、丹麥駐西班牙大使(2001-2004)。

企業。據統計：1902年英美煙公司在華銷售量為12,682箱，到1919年為309,028箱，足足增加了24倍。1919年，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資本已達12,479萬元，較其最初投資增加了590倍有餘。⁹

一次大戰後美國在華進出口貿易快速成長，在1931年日本侵略東北之前，美國已占中國進出口首位的國家，超過日本(含台灣，但未含東三省之統計)、英國(不包括香港)和德國。¹⁰另據美國企業史學者Mira Wilkins的研究，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在中國的投資領域不斷擴大，1930年達到高峰。即使中日戰爭期間，美商在日軍佔領區內仍持續運作，直到美國加入第二次大戰才急遽往下滑落。據他的估算：1900年美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約有1,750萬美元，1914年約4,200萬美元，1929年約11,380萬美元，1930年再上升至15,510萬美元(一說是12,930萬美元)，1936年則為9,060萬美元，1941年降為4,060萬美元。¹¹

就中國國內的新興企業發展而言，從1914至1922年間由中國民族資本所創辦的紗布廠總共有54家，其中1920至1922年間所開設的即達39家，這三年的發展已超過1914年以前20餘年間中外商人所開設的31家紗廠總數。新廠的增設加之原有老廠的擴充，全國的紗錠數由1913年的484,192枚猛增至1922年的1,506,634枚，布機則由1913年的2,016台增至1922年的6,767台。中國的麵粉工業是在20世紀初才開始發展的，基礎十分薄弱，國內所需麵粉一向多仰給進口洋麵。但到了一戰期間，歐美各國麵粉產量不足，開始向中國購買麵粉，中國由麵粉入超國變為出超國。

⁹ 1890年代，英、美煙草即進入中國市場，其中美國煙草大王杜克(James B. Duke, 1856-1925)和英國的帝國煙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mpany)兩方競爭激烈，最後於1902年合併創建英美煙公司。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前言〉，《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1冊，頁3；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3.

¹⁰ 以各國對華貿易而言，美國對華貿易在1931年占中國進出口的18.85%，1932年為21.16%，1933年為20.80%，1934年再上升為23.34%，周新，〈23年度我國之對外貿易〉，《東方雜誌》，第32卷第12號(上海，1935.06)，頁15。

¹¹ Mira Wilkins, "The Impact of Americ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on American-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 1786-1949," in Ernest R May & John K. Fairbank eds.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 285-287.

其結果又刺激了麵粉工業的發展，新設立的麵粉廠如雨後春筍；從 1896 至 1913 年總計約 53 家，資本總額 862.2 萬元，到 1921 年則有 123 家，資本總額達 4,000 萬元，麵粉廠數增加了一倍多，資本總額增加了四倍多。¹²1918-1920 年間，每年華資民族工業增長率達到 13.8%。上海是這波工業化浪潮的主要發源地，領軍的產業是棉紡織業，上海華資紗錠數從 1913 年 14.7 萬枚，到 1921 年增加至 50 萬枚，成長顯著。其中具代表性的企業家，如有留美背景穆藕初(1876-1942)，他與 1915 年在上海創立紡織廠和申新公司的榮宗敬，都各自擁有十餘萬枚紗錠。¹³

歐戰以後中國新興企業發展的趨勢，誠如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等學者所言，一次大戰爆發提供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1915-1927 年間，由於戰爭提供的市場機會、中國市場的開放和國家力量的較少介入及其他經濟因素，造就一批中國資本家的興起；此時也是國際資本與外國技術熱絡於中國市場的時間，從而形成民族企業與外國企業的微妙複雜關係。¹⁴白吉爾的關懷主要在於一戰以後由於中國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中央力量的削弱，政府威信的低落，使得 1915-1927 年成為中國資產階級鼎盛發展的階段，也使中國企業家卓有成效地開拓了通往現代化的通道。然則，我們也必須注意歐戰時期中國進出口貿易事實上是呈現整體蕭條之慘境，而中國新興企業卻能在此一凋弊衰象中找到出口，1916 年海關報告就提到「近年仿製貨物，進步速極最顯見者，棉貨、自來火，幾與外來之品，能以相敵。」¹⁵歐戰時期中國對外經濟關係整體不佳的情況下，中美進出口貿易卻能脫穎而出，從具體事實考察則可發現此一現象係和歐戰爆發後中美間經濟交往的網絡相聯互動，彼此輝映。

¹²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304。

¹³ 丁日初，《上海近代經濟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2卷，頁104、123。
關於劉鴻生的最新研究，可參見：Sherman Cochran & Andrew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¹⁴ 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75-80。

¹⁵ 國史館重印，《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民國五年(1916)，第1卷，頁14。

三、企業、技術與關係網

一戰爆發以後不論就中美進出口貿易的增加或美國私人企業的在華投資或歐美國家的技術引進中國，都呈現特別的繁榮景況，此與中美兩國的經濟活動、技術引進和人才交流所形成的關係網，環環相扣。這些關係網內包括一戰後留美歸國的實業家，他們建立現代化新式企業，並和美國方面有密切的交往，促進了中美間的聯繫。不少中美交流組織亦扮演重要角色，例如：「美國大學俱樂部」(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中美工程師協會」(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和美國商人團體——「美國亞洲協會」和「美國中國商會」。這些中美商人、技術組織和知識群體的互聯和發展動向，都是前所未見的。

一戰以後在上海從事棉紡工業，並由此發跡的代表性企業家莫如穆藕初(1876-1942)。他曾在德州農業與機械學院(Texas A&M)學習植棉與紡織，獲碩士學位，譯有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科學管理法》(*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為中國引入泰勒科學化管理法的第一人。¹⁶1914年7月底，也就是大戰發生前夕，穆藕初回到上海，應邀至江蘇省教育會及各地演講，分享留美心得。同時開始投身於棉紡業，先後集資創設上海德大、厚生紗廠，又與人聯合發起鄭州豫豐紗廠之創建。他辦的紗廠採用泰勒的經營管理法，成為同業觀摩的對象。¹⁷穆藕初除引進新管理法經營紗廠外，亦著力於引進、推廣美國棉種與農學知識傳播。1915年起，他在德大紗廠附近建立60畝的穆氏棉作試驗場，自美國喬治亞州引進各式棉花試種，並發佈試

¹⁶ 穆藕初於1909年赴美留學，1913年取得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農學學士學位。其後入德州農業與機械學院學習紡織工業，1914年獲碩士學位；參見“Mu Hsiang-yueh,” in Howard L. Boorman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79), Vol. 3, 38-40。穆藕初將泰勒書名譯為《學理的管理法》，於1915年11月至1916年3月於《中華實業界》連載，1916年6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刊行；參見穆家修等編，《穆藕初先生年譜(1876-194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62-63、84-85。

¹⁷ 穆家修等編，《穆藕初先生年譜(1876-1943)》，頁59-62、64、196。1920年美國議院團來訪時，亦曾參觀厚生紗廠。

驗報告。¹⁸穆藕初與中央政府所聘請之美籍棉業專家喬勃生(英文名不詳)有所往來，討論美棉於中國之栽培。¹⁹一戰期間(1917)穆藕初與另一著名棉紡企業家聶雲台(聶其傑，1880-1953)等人曾組織中華植棉改良社、華商紗廠聯合會，大力推廣美棉栽植。1919年華商紗廠聯合會曾聘請美國顧克(英文名不詳)博士來華協助技術改良。²⁰聶雲台亦曾赴美留學，1915年以中國實業團(Chinese Commercial Mission)副團長身份赴美考察，此次考察行程係應去年(1914)來華之太平洋商業代表團(Pacific Commercial Commission)邀請，參訪舊金山之巴拿馬賽會(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並考察美國各大城埠，期間聶氏力邀美國棉業專家來華調查並擔任顧問，協助改良中國的棉花種植。²¹

穆藕初在一篇關於中美工業與商業的專文中，曾闡述一戰以後中國進口美國機械對近代中國實業開展的重要性，並特別強調留美歸國人士開辦的新式工廠在引進新技術方面的貢獻。在1917-1919年間，穆藕初從美國就買進了共750,000枚紗錠(含他名下工廠所需與受他人委託採購在內)；此外，他相當推崇畢業自麻省理工學院的唐炳源(Tang Ping Yuan, 1898-1971)，此君於1923年歸國，在1930年代已是慶豐紡織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九豐麵粉公司董事、潤豐荳油公司董事等職。²²美方資料亦顯示，1918年中國粗

¹⁸ 穆藕初，〈報告美棉遷地之效驗〉，收入穆湘玥著，《藕初五十自述(下)》，《中國現代自傳叢書》(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為據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印行)第1輯第10冊，頁46-49。

¹⁹ 穆家修等編，《穆藕初先生年譜(1876-1943)》，頁106、111。

²⁰ A.R. Burt, J.B. Powell and Carl Crow eds., *Biographies of Prominent Chinese* (Shanghai: Biographical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25), 66; 穆家修等編，《穆藕初先生年譜(1876-1943)》，頁106-111、147、154。

²¹ 據江紹貞，〈聶雲台〉，收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徵求意見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第3輯，頁110-115，「聶雲台是聶緝規的第三子，少年時隨父住上海，跟外國人學英語，兼學土木、電氣、化學等科。後來到美國去留學，加入過留美學生組織的「大衛與約那爾」(David and Jonathan)的兄弟會組織。」雖然該書1980年出版之版本已無赴美留學及加入兄弟會之語，但其曾跟隨外人學習，且英文流利則為確認。另可參見江紹貞，〈聶雲台〉，收入李新、孫思白主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民國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2卷，頁249-255；聶雲台於1904年在上海組建復泰公司，承包華盛紡織總局。1909年收購華盛全部股份，改名恆豐紡織新局，親任總經理。

²² Mou H. Y.,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American University Men in China* (Shanghai:

棉產量約 250 萬包(bale, 1 包為 500 磅)，美國約年產 1,200 萬包。中國棉紡織業在質與量上都進步快速，這和美國專家的技術引進頗有關係，特別是南京大學農學系扮演了培育人才的重要地位。²³

一次戰後是一批上海的新興企業家崛起的時間，此時也適逢一批清末留美公費生歸國，投入中國初起步的現代新式工業和現代銀行業等新興企業。這批新興企業家，他們引進西方現代管理的方法和經營型態，並且結合新的一批華人同業工會組織。為擴展成員間的訊息，引進新觀念，他們出版專業雜誌，介紹新的管理方法和生產技術，分析國外市場等。1920 年的上海中國總商會的領導層選舉中，一批新興的企業家拱出 42 歲的棉紡企業家聶雲台打敗了傳統買辦朱葆三(1848-1926)，成為上海總商會的新總會長。在這次改選中，一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成長起來的工業資本家、航運業資本家、銀行家成員加入上海總商會，並有不少成為領導層；這次上海總商會改選的結果，體現近代企業家所組成的新陣容取代了原有的紳商領導體制。²⁴

新興企業家社群中有許多是「美國大學俱樂部」(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 AUC)的成員，像穆藕初於 1923 年擔任該俱樂部主席。該組織由畢業自美國大學的中美人士組成，自承以知識份子的使命，推動中美友好關係為宗旨。大戰時期的國際情勢分析與和平秩序的建立始終為該組織所關注，例如 1918 年該俱樂部餐會中討論的主題即是〈戰爭中的道德士氣〉(The Morality of War)。²⁵「美國大學俱樂部」成立於 1902 年，但其於 1908 年始

The Comacrib Press, 1936), 119-120. 唐炳源於 1947 年遷居香港，翌年創立南海紗廠，有「紡織大王」之稱。

²³ Julean Arnold, "Chinese Products of Interest to American," in Julean Arnold and Various American Consular Officers eds. *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Vol. I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321.

²⁴ 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頁 245。富有改革精神的錢莊經理、上海錢業公會會長秦潤卿(名祖澤，1877-1966)則當選為副會長。

²⁵ *American University Men in China* (Shanghai: The Comacrib Press, 1936), 19-26. 該組織於 1930 年共有 10 名終身會員，196 名一般會員，其中有 97 名中國人。1933 終身會員大幅增加到 76 名，會員總數達 383 名，共有 207 名中國籍會員。1935 年，共有 106 名終身會員，會員總數 396 名，其中有 204 名中國籍會員。工程界的成員描述參見該書，頁 90-106。

接納華人為會員，因此一般誤以為成立於 1908 年。自成立初期到 1912 年間，主席皆由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出任。唐紹儀(1862-1938)曾於 1913 和 1919 年出任兩屆主席，創華人出任此一職位之先例。美國人出任俱樂部主席者有：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 F. L. Hawks(1864-1947, 1915 年主席)、美孚石油公司的 W. W. Stephens(1916 年主席)、美國在華商務參贊阿諾德(Julean Arnold, 1875-1946)於 1918 年任主席。《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Weekly Review*)的鮑威爾(John Benjamin Powell, 1888-1947)則曾於 1917 年擔任秘書。「美國大學俱樂部」歷任主席皆由頗具社會威望的中美人士擔任，可見得此一組織標舉中美友誼的意義。俱樂部中的華人成員在 1920 年代以後，更活躍中國政商、工程和教育文化界，在各領域位居要職，例如：財政金融界的孔祥熙(1880-1967)和宋子文(1894-1971)，學者群中胡適(1891-1962)、外交家王正廷(1882-1961)亦為該會的活躍人士。理工領域則有鐵路界的凌鴻勛(1894-1981)、顏德慶(1878-1942)和陳祖貽(1901-1985)，水利界的孫輔世(1901-2004)、張含英(1900-2002)等，氣象學的竺可楨(1890-1974)等人。如果沒有這批歸國學生帶回新的技術，近代中國的科學化和實業化很難展開。

一次戰後，同時也是各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積極組織跨國機構，以促進科學專業化和工程技術的合作的時代。1919 年 7 月，第一屆國際研究大會(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成立於布魯塞爾，共有十一個創始國(含日本)，超過二百個會員代表，其中美國共有 21 個會員代表。²⁶雖然英國早於 1901 年即於上海創建「中華國際工程學會」，但該組織成員主要以負責上海公共租界工程為主，與創建於北京的「中美工程師協會」之承攬北京政府的大型公共工程略有不同。²⁷「中美工程師協會」(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²⁶ Emily S. Rosenberg eds. *A World Connecting, 1870-1945* (Cambridge, Mass.,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932. 參見 *Report of the Meet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nd of the Affiliated Unions Held at Brussels, July 18-28, 1919*, 創始國有：比利時、加拿大、法國、不列顛聯合王國、義大利、日本、紐西蘭、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美國，<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84535/?page=1> (2015/01/01 點閱)。

²⁷ 詳見 Wu Lin-chun, "European Engineers in China and their Business: The Case of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 1901-1941," *Networks and Communication in East Asia and Beyond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6-7 March 2015", Royal Holloway

Engineer)成立於大戰結束後的1919年11月22日，成員主要為在華從事鐵路、公路、開礦、電訊、電力、電車和機械動力相關之工程，亦有少數大學教授參與。該協會以增進工程知識和實務經驗、維持高度專業和培養團隊合作之精神為宗旨，並出版英文刊物《中美工程師協會月刊》(*Jour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該協會的會員許多也是「美國大學俱樂部」成員，甚至有些美籍會員享譽國際工程界，地位相當崇高，例如：美國工程專家古德里奇(R. D. Goodrich)、曾任紐約水利局的資深工程師暨中國大運河署理工程師威京(Thomas H. Wiggin)、美國著名橋樑工程專家溫德爾(John Alexander L. Waddell, 1854-1938)、水利專家費禮門(John R. Freeman, 1855-1932，中文或譯為「傅禮門」)。他們承攬工程和投資的區域範圍，從美國本土、中國延伸到日本等遠東各國，甚至遠達歐洲。²⁸「中美工程師協會」與國際研究大會於同年先後誕生，說明在華中美工程師群體對中國工程學的知識化和科學化的熱誠與世界各國相比，毫不遜色。

北洋政府曾與美國政府訂有不少中美合辦實業的案例，例如開採石油、合辦無線電訊、導淮工程和電氣工程等事業。²⁹此外，1915年華商張振勛(1840-1916)等，為發展國際貿易，特聯絡美國商人在中國組織中美銀行，額定股本1,000萬，同年10月5日經財政部批准立案。張振勛且組織游美實業團訪美，當時《東方雜誌》亦刊出游美實業團在美之合影。³⁰以從事實業為職志的張謇(1853-1926)，於戰後曾從事中美實業合作事業，即稱中美同屬共和，其輩份情誼「若師弟」，美國應有「提絜之親」。他於1919年

University of London.

²⁸ 據1922年的會員名冊，除榮譽會員10人，共有一般會員147人，美國籍占87人，中國籍60人。另有準會員(associated member)23人，美籍占5人，中國籍18人。1922年的10名榮譽會員中，中美各占五名。參見*Jour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 Vol. 5, 1922.

²⁹ 詳見吳翎君，《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此外，1918年6月，北京政府交通部與美國西方電氣公司、日本電氣公司議定合辦中華電氣公司，資本額100萬元。參見李玉，《北洋政府時期企業制度結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620-621。

³⁰ 〈中國游美實業團在美時之紀念攝影〉，《東方雜誌》，第12卷第8期(臺北，1915.08)，收入王雲五主持，《重印東方雜誌全部舊刊五十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1976)，頁28957。

曾致信給美國公使的信函說：

嘗謂太平洋兩岸大陸中美若兄弟，而共和之輩分中美若師弟，以其關係之切，自應有提挈之親。公與赫綏君及貴國諸君，若更以感情及地位，進而謀兩國實際上之互助，其大有利於兩國，行卜如旭日之方升也。³¹

為了促進大戰時期對華貿易，1915年6月19日，除了原本的「美國亞洲協會」(詳下)的組織外，美國在華商人進一步於上海成立「美國中國商會」，商會組織雖屬民間性質，標榜為一非營利，非黨派色彩的組織，主張自由貿易、市場開放、私有企業和資訊自由交流等原則。然而該會成立之初即帶有官方色彩，不僅成立大會由美國上海總領事沙曼斯(Thomas Sammons)所號召，名譽委員則包含美國駐京公使和使館代辦、美國上海領事館總領事和美國資深副領事，可見得美國在華企業和美國政府間的密切關聯。首次執行委員會會議年會於1916年8月18日召開，據會員名錄共有31個公司會員和28位個人會員。本次會議中討論的焦點為大戰期間船隻載運不敷使用，必須藉助英船與日船所衍生出的相關問題。由於戰時英國實施「協約國敵國貿易法案」(Allied Enemies Trading Act)限制並檢查與交戰敵國的航海貿易等措施，以及日本對本國國民貨運費的優惠，使在華美國公司的出口業務受到波及。特別是英國對於在中國出口的貨品不得運往至德奧敵國要求出具證明文件，儘管這些美國公司的貨品係運送至美國本土，但仍被英國領事在證明文件上予以刁難，以致延誤交貨，甚至有些美國公司還被英國列為拒運的黑名單，「美國中國商會」希望美國政府能循外交途徑解決此事。³²

³¹ 張謇，〈為組中美實業復芮恩施博士函〉(1919)，收入張謇研究中心編，《實業》(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張謇全集》第3卷，頁803。1919年芮恩施陪同美國議員團訪華，芮恩施和赫綏君表示將招攬一批美實業資本團與中國人士合組發展工商業者，張謇對於中美兩國如何組織合作和進行方針，望之甚殷，而有此一信函。赫綏君之英名不詳。

³² 該會創始委員有：大來公司(Robert Dollar Co.)、美孚石油、勝家縫紉公司(Singer Sewing Machine Co.)、美國鋼鐵公司(U. S. Steel Products Co.)等大企業老板；首任主席為J. H. McMichael，副主席為J. W. Gallagher，秘書為P. L. Bryant.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Ending, Aug. 18, 1916*, 1-2, 52-57.

一戰以後，美國在華商會和上海外商總會間開始有密切的交流。首任「美國中國商會」會長麥克邁克爾(J. H. McMichael)曾呼籲在華美商必須主動和華商建立交誼和拓展社會網絡，而有中美商人團體踏出友好的第一步。1918年4月，「美國中國商會」邀集時任 San Francisco Chamber of Commerce 副主席的大來輪船公司老板大來(Robert Dollar, 1844-1932，曾任 Merchant's Exchange of San Francisco 主席)和甫從美國宣揚進軍中國市場歸來的商務代表阿諾德等人與中國實業界名人聚餐。大來言詞激動地談到如何喚起美國人重視中國市場的方案及步驟：首先是訪問美國各地商會，其次是邀請中國代表赴美訪問。當時在舊金山才剛成立中國俱樂部(San Francisco the China Club)，人數並不多。大來提及「美國外貿協會」(Foreign Trade States)上次聚會共有 1,500 人參加，與會人士最關注的是南美貿易，經由他本人和其他人的鼓動，美國投資者始將中國放入市場版圖的規劃之中。在「美國中國商會」這次的聚會中，駐滬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朱兆莘(甫被任命為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1879-1932)也向在座的中美商人表示，中美之間應有更多的經貿交流和經濟合作。此次聚會，出席的中國工商企業家則有：中國銀行的張嘉璈(1889-1979)、L. F. Chai(代表華興麵粉公司，不知中文名)、聶雲台(聶其傑，代表華豐紡織公司)、沈敦和(代表華安合群保壽股份有限公司，1866-1920)。³³同年4月15日，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副會長沈聯芳(1870-1947)邀請「美國中國商會」第二屆主席伯恩(W. A. Burns)、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ual S. Reinsch)、上海總領事沙曼斯、美國在華法庭法官羅炳吉(Charles S. Lonbingier)、美國亞洲協會主席弗萊明(W. S. Fleming)與中美商人晚宴。雙方興緻高昂討論如何促進中美商務發展，宴會大廳中裝置協約國家的國旗、鮮花和各式彩燈，顯示中方對此次交誼的重視。³⁴

1918年4月「美國中國商會」召開的第二次執行委員會議年會中，會員數已增加，共有公司會員 38 位、個人會員 28 位、非駐地會員 5 位。大會首先表明去年(1917)以來對商會最重大的事件(the most momentous event)即

³³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Ending, April, 1918, 17-18.*

³⁴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Ending, April, 1918, 18-21.*

是美國參加大戰，此一舉動勢必使得美國政府調整其商業事務，但強調美國和協約國家為同一目標而合作努力的同時，仍需謹守創建「美國中國商會」的基本原則，亦即擴大美國在中國的貿易；不論現在或戰後，美國在華商會在戰事的壓力下，都必須確保對華貿易得以持續。這次執行委員會中亦提到美國對華出口價值的快速增加：大戰爆發前六年平均值約 3,500 萬海關兩，過去十年的平均值為 4,300 萬海關兩，過去四年的平均值為 4,800 萬海關兩，而 1917 年的數據則是 6,100 萬海關兩，顯現中國市場對美國愈趨重要。³⁵為因應戰爭局勢，此次會議中亦討論與英、法等協約國家在華商會和僑民的合作問題，但他們更強調的是美國商會必須保持和「美國亞洲協會」的合作串聯。會議紀錄中特別提到過去二年來美國兩間私人企業在華的快速成長：一為以生產蛋品類為主的阿蒙鳥禽公司(Amos Bird Co.)，一為奇異電器公司(American General Edison Corporation of China)。這兩家公司靠著中國的廉價勞工快速獲利，不僅提供中國市場的需求，且外銷全球，堪為美國其他製造業的榜樣，紀錄中也提到美國資金和製造業的進駐中國，對於中美雙方都是互惠互利的雙贏策略。³⁶

如上所述，上海華人新興的企業家中，特別是棉紡織業，有不少人具有留學美國背景。他們適巧於一次大戰後回到中國，將美國棉紡織業和科學管理方法引引進中國正新興的棉紡織產業。不惟新興企業如此，據胡光廙(1897-1997)的說法一次大戰後在美國學習工程的中國留學生，也基於改造中國的想法，回國參與一次戰後中國急起直追的實業建設。這批學習工程的留學生，不少在租界裡從事工程設計和進口機器物料。而胡光廙本人也是「中美工程師協會」的會員。³⁷另一幅相應的圖像則是在華美國商人同樣展現了對中國市場的企圖心，在上海的「美國中國商會」在大戰以後更加積極爭取中國市場，利用中國廉價勞工，引進資金和設廠投資，並且與上

³⁵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Ending, April, 1918*, 1-3, 5. 會員名錄見該書，頁 114-120。

³⁶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Ending, April, 1918*, 11.

³⁷ 胡光廙，《波逐六十年》(臺北：新聞天地社，1967)，頁 214-220。

海華商主動交流，爭取更多的進出口貿易和市場訂單。此外，據《申報》記載，1917年2月曾有羅司(David S. Rose, 1856-1932)實業團訪華。羅司曾任威斯康新州密爾沃基市(Mayor of Milwaukee, Wisconsin, 於1898-1906, 1910-1912年間在任)市長，是美國全國商會聯合會組織的會員，曾於1916年游歷北京、上海，並調查中國商業情形，由於這次訪問他和上海總商會成員相談甚歡，乃促成1917年2月率領美國實業團體再度訪華之舉。³⁸當時曾醞釀成立「中美國際商會聯合會」，希望通過中美兩國各地商會的攜手合作設立一個促進中美貿易的聯合組織，此一提議曾於上海總商會中有所討論。³⁹在一次大戰行將結束之際，在上海中美兩國商人團體也曾討論過組織「協約國聯合商會」的構想，一來力圖保持協約國家在戰時的合作以謀求世界經濟的復甦，二來共同抵制戰後德奧等同盟國在遠東商場恢復其舊有之競爭力，並認為上海的特殊商業地位最為適宜設置此一組織。⁴⁰雖然「中美國際商會聯合會」和「協約國聯合商會」的構想和組織於戰後並未馬上付諸行動，但由此也看出中美兩國商人如何積極確保彼此共同利益的強烈企圖心。也就是上述的這些因素在一次大戰時期，交織出一個具有新氣象、新企業思想的社會關係網，在中美經濟交往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四、美國亞洲協會的主張

「美國亞洲協會」是十九世紀末美國商人在華具代表性的利益團體，其前身為1898年1月6日成立的「美國在華利益委員會」(Committee on American Interest in China)，該會的成立宗旨為促使美國政府積極拓展在中國

³⁸ 〈總商會歡迎美實業家紀盛〉，《申報》(上海)，1916年6月17日，第3張。關於1917年羅司實業團訪華，可詳見賈中福，《中美商人團體與近代國民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95-102。

³⁹ 〈組織中美國際商會之函稿〉，《申報》(上海)，1917年4月23日，第3張。滬商對於加上「國際」兩字與原案未甚符合，冀再提全國商會討論；參見〈滬商會對於組織中美國際商會聯合會之意見〉，《申報》(上海)，1917年5月17日，第3張。

⁴⁰ 〈組織協約國商會之主義〉，《申報》(上海)，1918年9月29日，第3張。據該報之引述：「此議首倡為英國某著名銀行家，美人商會即援其義，首先向中國商會之代表作公共之討論，中國商會極以為然，而其他商人團體之代表，亦表贊同」；〈組織協約國聯合商會之贊同〉，《申報》(上海)，1918年10月7日，第3張。

市場的商業利益。6月，該會擴大改組為「美國亞洲協會」(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總社設於紐約，並於上海、香港和日本橫濱、神戶設立分會(後擴及新加坡和馬尼拉等地)。清政府駐美大臣梁誠(1864-1917)形容「美國亞洲協會」：「該會實為東方商務一大中點，外部遇有事件恆向取決，誠當與其在事諸人婉切商磋，得其一言相助，則事機可得八九分。」⁴¹成立之初，即發行機關報——《美國亞洲協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898年7月25日創辦)，執筆陣容包含著名記者、大企業家和美國在華官員等。這份刊物的言論，具體反映美國在一戰時期對中國市場的企圖，和在華經濟活動的主張。⁴²

曾任職美國奉天領事，後擔任摩根財團副董事的司戴德(Willard D. Straight, 1880-1918)於1913年出任「美國亞洲協會」主席，任內擴大和改組該協會。1914年的「美國亞洲協會」年會上，司戴德在主席致詞時提到：由於歐洲主要國家捲入大戰，以致日本握有主導中國情勢的機會，許多人都在觀望美國對華政策的動向。儘管當時美國已退出六國銀行團，司戴德認為美國銀行團仍可以透過各項實業借款參與中國事務。他提到大戰對中國鐵路事業直接的影響：由於比、法、英等國捲入大戰，使得鐵路工程勢須延緩，其結果可能導致戰後「鐵路勢力範圍」的重新分配，此一情勢對美國顯然有利。⁴³大戰之初，司戴德於《美國亞洲協會期刊》發表〈歐戰與我們對外貿易的機會〉(The European War and our Opportunity in Foreign Trade)，呼籲歐戰是美國向外拓展市場的大好時機，美國銀行家應趁此機會將資金轉向南美洲及遠東市場促進美國的海外貿易。⁴⁴

⁴¹ 〈外務部收駐美大使梁誠函〉(光緒29年5月1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係史料·光緒朝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頁3542。引文中「一大中點」為原文所記。

⁴² 《美國亞洲協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哈佛大學收藏全套。據筆者逐一整理該刊物的主要歷史演變如下：1898年7月25日創刊，開本為B5。1917年3月改版A4大小，封面為*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1919年12月，封面改為*Asia: The American Magazine on the Orient*。1942年11月，該刊務又改名為*Asia and the Americas*，封面上大字為“Asia”，小字加上“and the Americas”。

⁴³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4, 292，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⁴⁴ Willard D. Straight, “The European War and our opportunity in Foreign Trade,” *Journal of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4, 296-299，為司戴德於1914年10月27日受芝

1914年11月,《美國亞洲協會期刊》刊出〈美國對華商業〉(American Business in Asia)一文,回顧從1784年美船中國女皇號(China Empress)首航中國後,中美經濟關係的進展。文中談及美國巴爾的摩飛剪船與英國商船在亞洲的競爭、美國對日本的貿易,並討論美國在亞洲市場的最大獲利——輸出粗棉換取精緻的絲品,以及美孚石油公司如何掌控中國石油市場的優勢。該文最後論述東方市場帶給美國人的異國想像,主張美國應以貿易開發亞洲,扮演拯救「貧窮東方」的要角。⁴⁵1914年12月,又刊出持相似論調的篇名文章〈中國商業的未來〉(The Commercial Future in China)。⁴⁶

1916年11月和12月,《美國亞洲協會期刊》一連刊出兩篇關於中國棉業與棉紡工業的系列專題。在11月文章中指出許多人都忽略中國是世界生產棉花量的第三大國,美國產量佔世界首位,年約13,000,000至14,000,000包(bales, 1bale約等於4擔picul),其次為印度,年產量約7,000,000包,而中國居第三,約2,000,000包。作者特別指出:中國粗棉的產量係在未有政府挹注經費於實驗農場、種子改良或專家協助等背景下,就達到約美國七分之一;儘管有一批赴美研讀農業的留學生返華,從事棉業改革,但為數仍不足。作者認為以近年上海一地棉紡工業的欣欣向榮,中國如能引進現代科技,延聘更多技術專家,上海可望成為「遠東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 of the Far East)。⁴⁷12月號的專文則從棉花田實驗、工人的專業培訓和改良種籽的技術層面,縷述未來中國棉紡工業的發展方向。⁴⁸

1916年11月,美國駐華與日本商務專員(American Commercial Attach for

加哥·伊利諾製造協會(Chicago, Illinois Manufacture Association)的邀請所發表的演講文。吳翎君,〈司戴德與清末民初中國〉,「辛亥革命暨南臨時政府成立國際學術討論會」,南京:南京大學,2011年10月16-17日,《辛亥革命暨南臨時政府成立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上冊,頁142-155。

⁴⁵ “American Business in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4, 310-313.

⁴⁶ “The Commercial Future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Dec. 1914, 335-338.

⁴⁷ “China’s Cotton Industry” from *the N.C. Daily New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6, 304-306.

⁴⁸ “The manufacture of Cotton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Dec, 1916, 335-340.

China and Japan)阿諾德登高一呼，希望美國大企業將資金轉向中國。他提及自從大戰爆發以來，多數美國製造業關注的仍是前進南美市場，將其視同於美國對外貿易的全部。但大家不了解中國市場是更為巨大、更有潛力。阿諾德主張中國人口比起南美逾十倍之多，中國人又比拉丁美洲人更加勤快、工資便宜，而且國內物產豐饒。當前亟待發展麵粉、棉紡織、榨油、火柴、玻璃等新式工廠的中國，更需要外國的投資和技術引進，而美國銀行家和企業家適可扮演此一角色。他同時認為，中國正萌發出一種「國族精神」(National Spirit)——富有理想，愛好和平，勤快積極，相信數年之間中國可望成為有組織的政府。他也細數當時美國在華勢力：美國在中國約有一千五百家商號，其中大公司約有一百家，包括最大的美孚石油公司。美國在上海的重要社群則有：「美國亞洲協會」、「美國中國商會」、「美國大學俱樂部」和「美國婦女俱樂部」(American Women's Club)。阿諾德強調美國在華商會、美國駐華領事和華府的「國內外貿易發展局」(The Bureau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mmerce)應密切合作，協助美國製造業和商人提供在中國發展商業的便宜措施，而此事不必等到大戰結束，更要把握當前的大戰時機。⁴⁹

次年1月(1917)，該刊刊出〈中國——美國沉默的夥伴〉(China, American Silent Partners)一文，文中分析中國人自陳「中國人尊敬英國，愛好美國，畏懼日本」一說的歷史淵源。作者Jeremiah W. Jenks(1856-1929)縷述自清末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以來的中美傳統友誼，認為美國更應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國家，而日本自1860年代以來的改革進步，則印證了東方民族是可以改變的。他首先揭示美國人仍停留於「睡獅中國」的看法有誤；恰好相反，一股中國民族主義的新精神正瀰漫全中國，這股士氣遠超乎美國人的想像。他主張中國人追求富強和發展實業的企圖心非常旺盛，作者甚至以「極度務實的中國人」(The intensely practical Chinese)來形容

⁴⁹ Julean Arnold, "American Trad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Dec, 1916, 333-335.阿諾德大力倡導東方和中國貿易重要性之要角，不惟在各種場合一再呼籲美國政府端出更積極的對華商業政策，並在《美國亞洲協會期刊》上撰文，或接受該刊訪談，闡釋其見解。阿諾德於1914-1917任美國駐華和駐日商務幫辦。

此一動向。這篇文章用詞激昂，以美國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果斷買下路易斯安那地區(Louisiana Purchase)，因而為美國的大西部奠下基礎的壯舉為例；此時中國的情況，正可讓美國挾著龐大的動力穿越太平洋，但美國要的不是領土，而是商業貿易。他同時提到北京政府有不少誠實、愛國，且有才幹的官員(並特別推崇財政部長陳錦濤的留美背景)，呼籲美國必須把握機會，以財政援助中國，不宜錯失大好機會。⁵⁰為說服美國各大商會前來中國投資，阿諾德在美國舊金山等太平洋口岸和美東紐約、波士頓等地到處演講。1917年3月，《美國亞洲協會期刊》刊出附有阿諾德照片的專題報導，並再度援引前述專文的主要內容，強調目前美國對華貿易僅占中國所有貿易的8%-10%，雖已是自美國內戰以來，對華貿易的最高點，但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編輯也以顯著的標題指出中國的土地是日本的五十倍大，人口比日本大八倍，並擁有廣大天然資源，其發展潛力可以期待。⁵¹

從《美國亞洲協會期刊》的文章看來，一戰期間在討論投資中國市場的同時，美國企業界並不排斥與日本的合作，甚至也主張與日本合作共同開發中國，他們事實上是將日本、中國與遠東的貿易視為整體來考量其利益。1917年，美國紐約嘎什頓威格摩爾公司(Gaston, Williams & Wigmore)公司的副總裁威廉斯(Williams H. Williams)曾親訪問上海，並接受美國亞洲協會訪問，他針對美國在亞洲的宏大商業計劃，提出三個主張：一、美國政府應對美商在海外的投資有所承諾和保障，且讓美商感覺到有效力的保障；二、在美國政府的資助下儘速拓展太平洋航線；三、美國可與日本共同合作，日本應會是誠懇的商業合作夥伴。他認為美國在中國的商業發展，光靠貿易是不夠的，必須有大筆的投資。他表示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就向他提起：美國老是說要投資中國，且誇說美國對中國比其他國家友好，但都是光說不練；美國如果真要發展與中國的關係，光靠商品貿易無法發揮太大作用，美國政府必須強力推進美國大企業到中國來投資。「美國在中國

⁵⁰ Jeremiah W. Jenks, "China, American Silent Partn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Jan., 1917, 363-367.

⁵¹ Frank F. Davis, "Broadening Our Chinese Trade,"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March, 1917, 41-43.

的貿易和投資，如果抽掉美孚石油公司，就什麼也沒有了。所以，一定要有美國政府的推動政策和大企業的進駐投資。」⁵²

嘎什頓威格摩爾公司係一戰時期由數家船東宣佈合組聯營的航運公司，於德勒克拉瓦註冊，資金五百萬，公司名下有十四艘船。聯營之際，《紐約時報》還熱烈報導此事。這家懸掛美國國旗的新聯營公司，同時經營大西洋和太平洋航線，但主要因航行太平洋線——從舊金山到俄國、日本和中國口岸而聲名大噪。⁵³威廉斯表示美國如要發展中美貿易，以現有的商船是不足的，呼籲美國政府應投資太平洋航線的運輸，而且此事大有利益可圖。威廉斯離華前，曾和甫卸內閣總長的唐紹儀、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等人會晤，並留下合影。(圖 1)他也抱怨說美國在海外投資的企業從未從美國政府獲得適當的保障，在中國政治不安穩的情況下，任何的礦業投資如果得不到美國政府的支持，企業家是不太願意冒此風險的。⁵⁴當時《申報》稱威廉斯所屬為「美興公司」，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於歡宴致詞中說「東西兩大共和國永聯為兄弟之邦，商務益臻發達。」威廉斯暢言商人對國際友誼的責任不亞於外交家：「外交家之光陰，其能專注外交者不過四分之一，而商家之光陰，其能從事於國際發生商務上更友好交誼之外交者則占四分之三。」⁵⁵從這些言論也可以看出商人組織自詡在經濟外交上的任務和

⁵² 該文提到上海總商會，但並未指出是誰，由合影始知是總商會會長朱葆三。“The Trade of Asia, An American-Asiatic Business Programm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H. Williams, Vice-President of Gaston, Williams & Wigmore, Inc.,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pril. 1917, 122-124. 〈總商會歡宴美國官商〉，《申報》(上海)，1917年1月15日，第3張。

⁵³ *New York Times*, Feb. 24, 1916. 事實上，早在大戰爆發之初，中美兩國政府曾合作開通太平洋航線的合作。歐洲大戰爆發後，西洋航輪銳減，交通部長梁士詒認為此一機會有助於中國振興航運，乃向美國公使芮恩施籌辦中美合作航運事業。「依此一合同，中國政府擔保該輪船公司於若干年內，按照所投資本，足有若干利率。但凡中國貨物，該公司須與以特減費之利益；該公司並發行300萬美元債票，以籌足資本，若干年後中國政府有權收買該公司股票。」中美輪船運輸公司最後破局，據梁士詒所言「帝制發生，干戈擾攘至新事業於焉中斷。」但中美兩方實各有變因。鳳岡及門弟子謹編，《民國梁燕孫先生士詒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282-285，收有完整合同及交涉經過。

⁵⁴ “The Trade of Asia, An American-Asiatic Business Programme,” 122-124.

⁵⁵ 〈總商會歡宴美國官商〉，《申報》(上海)，1917年1月15日，第3張。

作用。



圖1：美商Williams(右三)、唐紹儀(右四)和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右一)合影
資料來源：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pril, 1917, p. 122.

1917年7月《美國亞洲協會期刊》特闢「對華貿易」(The Trade of China)專題，包含三篇文章：〈在中國投資的利益〉(Profits on Investment in China)、〈大戰與遠東商業〉(The War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Far East)、〈學習漢語的商業政策〉(The Business Policy of Learning Chinese)，後兩篇由著名記者鮑威爾執筆。〈在中國投資的利益〉文中提到：中國的工資低廉，約美國的十分之一，而中國的棉花工廠、開礦和建造鐵路三種產業具有龐大的投資利潤。〈大戰與遠東商業〉一文，則提出大戰對東亞商業的影響有三：一、日本工業的迅速發展；二、中國相對保守的心態；三、對亞洲市場興趣的增加和東亞工業的發展。他認為這些商業上的影響，其重要性不亞於政治外交領域。日本受大戰的影響對同盟國家的輸出也大有增加，1915年有156,000,000美元，1916年約有220,000,000美元。其中有約70,000,000美元來自俄國的訂單，出口至英國亦增加不少，美國則約占日本出口的30%。在國際航運方面，日本亦為一戰的受惠者，1914年美國進口貨物中，由日本輪船載

運的僅 2.77%，但到 1916 年，已上升到 8.12%。文末強調東亞低工資也使先進工業國家的工資平衡受到威脅，為謀求雙方的利益，應在東亞培育技術工人使其得以自製半成品商品，如此將使西方工業國家和落後的廉價勞力國家彼此受惠。〈學習漢語的商業政策〉則強調美國若要拓展對華投資和擴大商業利益，有必要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以減少誤解。通過語言的溝通——不論是上海的洋涇濱英語(Pidgin English)或翻譯的普遍化，中美人士雙方的鴻溝已愈來愈少。總之，三篇文章從不同角度切入，試圖分析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和方針以及日本工業的快速崛起。⁵⁶

至於如何看待對中國事務具有野心的日本？做為美商團體的機關報，《美國亞洲協會期刊》與美國在華外交官和商務參贊往來密切，基本上呼應美國政府的遠東政策。1915 年，被美國人冠以「日本摩根財團」的日本大企業家澀澤榮一(Baron Shibusawa Eiichi, 1840-1931)提出美日攜手合作開發中國的想法，⁵⁷當時美國政府對於日本擴大在中國的影響力有所疑懼，並時而展現與日本競爭的意味。直到 1917 年 4 月初美國參戰後，因美、日同屬協約國盟友，美國對中國外交事務上與日本的合作始趨於明朗：不僅於 1917 年 11 月初與日本簽署「藍辛——石井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且在中國的投資開發問題上亦傾向合作。⁵⁸美國參戰後，1917 年 5 月《美國亞洲協會期刊》刊出文章〈我們亞洲的聯盟〉(Our Asiatic Allies)，強調美國必須在中、日之間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將日本因素納入遠東整體利益來考量，傾向美日合作的態度。⁵⁹但該刊對於中國反日民族主義之情結亦抱以同情，特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後中國反日情緒持續高亢的狀況下，該刊曾於 1917 年 6 月刊出愛荷華大學商學院的中國留學生 T. L. Li 投書，該文強烈反對美日合作開發中國，認為以美國在工業技術上的領先，根本不需要與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日本共同合作來開發中國，指稱美國如和日本

⁵⁶ “Profits on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War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Far East,” “The Business Policy of Learning Chinese,” July, 1917,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378-386.

⁵⁷ 澀澤榮一於 1902 年訪美，被美國媒體稱為「日本的摩根」(J. P. Morgan of Japan)，當時他名下已有 40 餘間公司、銀行和鐵路事業。*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02.

⁵⁸ 吳翎君，《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頁 164、200-201。

⁵⁹ “Our Asiatic Allies,”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May, 1917, 163.

合作，等同狼狽為奸。⁶⁰

1917年2月，中國宣佈與德斷交，美國國會於4月初宣佈參戰。此時中國是否可能隨美國參加一戰？中國為何參戰？為何中國加入日本和協約國一方？以及中國希望得到英國和美國什麼樣的支持等議題，同樣受到美國亞洲協會的關注。在〈中國為何參戰〉(Why China Enters the War)一文中，就中國政府對德宣戰的理由，作者略有保留。因為日本素來對中國的野心和挑釁絕對勝於德國；此外，如以德國採用潛水艇作戰以致中國人遇難作為參戰理由，亦不具說服力，因為各國都知道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是不力的。這篇文章對中國為何和德國斷交，且可能加入協約國一方的發展略有質疑，但也分析中國欲藉由參戰機會取得若干利益，包括希望獲得英美的支持參與國際事務、財政和軍事援助以及戰後恢復目前被剝奪的權益等多方考量。他提到儘管日本同意中國參戰，但已做好如何保護在中國既有權益的盤算。該文圖文並茂地介紹中國新式部隊的裝備，卻認為這些部隊和裝備若由中國軍官指揮，將無法發揮作用。⁶¹此文大致呼應了美國政府最初對於中國參戰態度的疑慮與態度，並不鼓勵中國參戰，以免中國成為協約國家的包袱。⁶²

1917年8月14日中國正式對德、奧宣戰後，《美國亞洲協會期刊》刊出「今日中國」(Present Day China)專欄作家哈汀(Gardner L. Harding)所撰之〈戰時中國的角色〉(China's Part in the War)。不同於上述中國參戰前該刊持論的消極態度，作者提到中國從華工派遣、原料、兵工廠和食物供給均可對協約國家的援助發揮重要的作用，並肯定中國的參戰可使遠東局勢更加穩定，有鼓舞協約國士氣的作用；強調日本、中國和美國在同一目標的合作之下，中國將在未來更穩定的遠東局勢上發揮作用。該文以近二頁的篇幅介紹華工在英法華工營的優良表現，就中國人對歐戰的貢獻予以正面肯定。文中並提到上海新式工廠的發展，已略現規模，例如 Nicholsa Tsu (中

⁶⁰ "The Trade of Asia: An Objection to American Co-operation with Japan in China,"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June, 1917, 299-300.

⁶¹ "Why China Enters the War,"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pril, 1917, 163.

⁶² 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頁13-25。

文名不詳)的機械工廠在中國領班的帶領下，已可生產電車、鐵路、輪運等鋼鐵零件，上海新興的棉紡織工廠和漢陽鋼鐵廠也略有規模，甚至在西方技術支援下，剛萌芽的軍火工業，亦可發揮補給物資的作用。該文最後提到近年中國輸出大麥、大豆、冷凍食品和乾貨等的數量快速增加，這些都是中國對協約國家的具體援助。儘管這些物資的輸出是一種獲利交易行為，但就其結果仍對戰時歐洲民生食物的短缺提供了來源。⁶³也有資料顯示中國於大戰期間的 1918 年輸出的火腿肉有 400 萬磅之多，價值 60 萬海關兩(約值美金 716,000 元，當時 1 海關兩等於 1.193 美元)，而英國則是中國火腿產品的最大輸入國家。這些火腿的產地包括漢口、上海、杭州和雲南，特別是雲南火腿的口碑甚佳，其次為浙江和湖南。中國東北為大豆和豆油輸出中心，以大連為主要輸出口岸，1918 年輸出 146,186 美噸，價值 24,047,036 海關兩(合 28,747,764 美元)。⁶⁴

1918 年 11 月，該刊有〈中國近代工業的努力〉(China's effort in Modern Industry)，指出中國民間企業和新式工廠正欣欣向榮，但美國人多關注北京政爭的演變，而忽略了中國這股蓬勃發展的民間力量。該文配有一幅照片，內容為一群在工廠大門前的中國工人，照片說明稱這些工人工資少、工時長，但卻勤快認真，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事。文中特別提到中國新式工業的振興，上可歸功於清末湖北張之洞創辦漢陽鋼鐵廠，而張謇踵繼其後。最後亦提到留美學生引介新式機器的作用、中國棉紡織工業的興起，以及中國迫切需要外國的投資來發展實業。⁶⁵

隨著 1917 年 4 月美國參戰，8 月中國宣戰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海內外美國人愈來愈關注戰爭議題，關於如何發展中美經貿關係的言論已非焦點所在。特別是俄國大革命後的政治動盪，使得《美國亞洲協會期刊》愈來愈關注東方的政治議題。1918 年 4 月，該刊表明自美國參戰後他們已

⁶³ "China's Part in the War,"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Oct., 1917, 644-646.

⁶⁴ Julean Arnold, "Chinese Products of Interest to American," in Julean Arnold eds. *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Vol. II, 274. 該文也說據美國駐大連領事 Williams 的估算，東北年產 150 萬到 200 萬美噸的大豆作物，其中可能有至少 100 萬美噸輸往日本。

⁶⁵ "China's effort in Modern Industry,"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8, 963-967.

是一本「戰爭雜誌」(War Magazine)，並認為美國在這次大戰的巨大危機中，負有重大責任，宣稱「東方的危險即是我們國家(美國)的危險」、「我們已經在戰爭的中心。」⁶⁶1918年11月，一戰結束前夕，該刊為配合戰時節約政策，表示為節省刊物印刷經費，僅印行會員紙本，不再於書報攤零售。

大戰結束後，《美國亞洲協會期刊》重新省視該刊物的走向和編輯方針，他們意圖轉型為一本文化期刊，以分享東西文化交流的理想自許，並希望成為歐美國家認識亞洲的一個媒介。1919年11月，編輯部宣佈代表商人利益的「美國亞洲協會」組織正式退出該刊的管理和運作，這份刊物不再是該協會的機關報。1919年12月該刊改版並更名為《亞洲：美國雜誌在東方》(*Asia: The American Magazine on the Orient*)，封面已不再出現「亞洲協會」名稱，其報導內容雖包括遠東和中東消息，但中國議題始終占有最多的篇幅。該刊熱衷於中國風俗文化、美國人的中國印象及中國政治事務的觀察，原來作為美國商人在華商務活動的資訊報導，及為其利益團體代言的功能已不再明顯。⁶⁷

五、結論

一次大戰爆發之初，由於歐洲大國捲入戰事無暇顧及遠東，而使中立的美國得以盤整其海外市場及遠東市場的佈局。其中，中國市場的需求和條件無疑吸引美國資本家的目光。在此一契機中，中美兩國的企業主、商人及其利益團體所形成的關係網匯集交融成一股巨大的能量。他們視歐戰的爆發為開拓中國市場與世界接軌之契機，企圖通過中美長遠的友好關係，促使彼此互利受惠，使美國大企業得以進駐中國，到中國投資。中國方面，則又期盼引進美國方面的資金和技術轉移，提振中國的工業化，並

⁶⁶ "The Worst disaster of the War,"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pril, 1918, 273.

⁶⁷ 1942年11月，該刊物又改名為*Asia and the Americas*，封面上大字為Asia，小字加上and the Americas。抗日戰爭時期該刊對戰時美國遠東政策、國際關係、國民政府的戰時動員和國共關係等訊息亦相當留意。宋美齡、林語堂曾在該刊發表文章向國際宣傳國民政府抗戰的決心。

藉此打造現代中國工業化的夢想。此一中美經濟交往的關係網，共同造就一戰以後中美進出口貿易、美國在華投資、西方技術引進、美國政府對華經濟活動的盛況，並成為此後中美經濟關係發展的一個轉捩點。這些關係網中的各種組織群體彼此相互獨立，但其成員時有交錯重疊，密切聯結。在「中美工程師協會」和「美國大學俱樂部」成員，華人與美國人分任該組織之要職；在工商人團體則是中、美商人的密切交流，在技術引進和科學化觀念的進程展現合作與提攜的經驗。

由一戰期間美國在華商人的機關報《美國亞洲協會期刊》的報導，可看出該協會對中國國民精神充滿正面評價及凝聚中美友好的言論。這不僅祇是出於中國龐大市場的想像，而是寄望於中國可能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國家，為中國的崛起做好準備。該刊的言論和主張，推進了一戰時期美國政府和民間開拓中國市場的積極作為，而其關注的議題，則涵蓋中國社會接納以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科學和技術的條件和適應性。戰爭之初，該刊強調中國廣大市場的潛力、清新有活力的國民精神，廉價的勞工和勤勉的個性，主張美國人應發揮中美友好的傳統來協助中國。該刊亦熱衷報導中國欣欣向榮的各式棉紡織等機器工業、留美歸國學人的作用。在中美合作方面，表示中國人亟需美國的技術援助和資金投資，而美國人則應學習漢語，更加理解中國，更進一步呼籲中美攜手合作。他們也將亞洲視為一個整體，主張美國可與日本合作共同開發中國。待中國參戰後，該刊又大力肯定華工對歐戰的貢獻。更重要的是，該刊認為一戰時期中國向歐洲國家輸出大麥、大豆、冷凍食品、乾貨和火腿等食品，中國雖從中獲利，但此舉也對深陷戰火和物資匱乏的協約國家人民的生活和物資供給做出具體貢獻。「美國亞洲協會」不僅從政治層面對中國表示友善，更從中國所提供的經濟物資數據說明中國對歐戰的貢獻。

本文所探討的歐戰爆發後中美經濟交往的關係網，是一段中美共享與合作的歷史。在中國方面，中國必須迎向世界的主張，不惟在知識文化界，在一部份具有新思想的商人、企業組織和引介西方技術和知識體系的工程師團體中亦感同身受。泰勒的科學管理新方法、工廠管理和效率、棉紡機器技術和農田實驗等改良方法、研發新技術等科學方法和技術被大大引介

到中國來，成就中國擺脫貧困農業社會的主張和行動；各種新興企業和技術網絡欣欣向榮，並與新知識文化的百花齊放同聲共息，共同成為一戰後中國的新圖象，而具有特殊關係的美國則居間扮演了重要橋樑。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方面由於北京中央政府的力量薄弱，反而使得民間力量在這一階段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美國方面則是由美國政府扮演了「看得見的手」(visible hands)的綿密操作。美國駐華使領和商務參贊以及美國國務院之間對中國的商業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前所未有的熱中，並和美國資本家、工商團體組織相互攜手。1919年，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出版了由阿諾德主編的《中國商務手冊》(*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這份手冊分為上下二大巨冊，上冊 629 頁，下冊 467 頁。此書可謂教導美商如何洞悉中國市場現況、分析投資環境、各項商情蒐集和理想願景的教戰手冊，其中並要求美國駐華各領事館以更務實政策與美商共同合作，以促進美國在中國的利益。美國商務部自諛這套書對中國商務概況介紹之詳盡為「空前未有」。⁶⁸1922年美國政府頒布「對華貿易法」(China Trade Act)，該法係為在中國營業的美國公司所專門設立的，其基本內容是特准美國公民依照此一法案，在美國本土向聯邦政府登記在法律上作為美國的國內公司，但是總、分公司都必須設在中國境內，並且在中國境內營業，其可享有聯邦政府稅

⁶⁸ Julean Arnold and Various American Consular Officers, *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Vol. I, I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這份手冊，上冊參與編撰者尚包括領事館人員。先介紹中國各省發展概況的發展、中國進出口貿易和中美貿易的一般情況，其次就條約口岸各領事區域商業發展的調查，包括廣州、香港、奉天、上海、天津、廈門、安東、芝罘、大連、福州、南京、汕頭、青島等口岸，並配有五十餘幅照片和地圖。縷述中國各口岸的位置、人口、行政組織、教育、農產、礦產、交通電訊、公共事業、進出口貿易、旅遊設施、商業組織、美國利益和各地領事館的建議。下冊撰稿者涵蓋中美兩國人士，照片和地圖有20餘張。首先以24頁介紹中國歷史，從上古到民國肇建，略古詳今。其次，介紹中國政府的組織。接著依主題介紹中美之間的關係，包括中美商約、領事裁判、美國法院在中國、版權和專利、美商在中國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之處置(運貨、發票、護照、婚姻、生與死、財產擁有等等)、海關稅收、中國鐵路發展、中國政府的財政稅收、各地銀行、中國的行會和商會、中國物產與美國利益相關者(含礦業、畜牧業、林業、絲工業、製造業、糖業、棉織品等)、在中國的宣傳、勞工和生活水平，對美國製造業和商人的一些建議、進出口貿易、可能的遠景、訓練美國人認識亞洲的建議(包括學習語文、合作和理解、建立學校和提供獎學金等等)、美國在華學校的概況和中國留美學生的介紹。

捐的豁免權。⁶⁹這些政策都說明了一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大力支持對華投資和擴張商業的具體作為，並對日後美國在華投資產生了重大影響。

六、附錄

表3：中美直接往來貿易統計表，1864-1928

西元	洋貨輸自美國	土貨輸往美國	共計
1864	* 3,183,021	* 4,482,859	* 7,665,880
1865	* 482,593	* 5,864,825	* 6,347,418
1866	* 289,832	* 6,316,130	* 6,605,962
1867	* 702,683	* 7,493,318	* 8,196,001
1868	741,569	5,891,182	6,632,751
1869	1,382,918	8,173,532	9,556,450
1870	373,563	7,599,223	7,972,786
1871	449,279	10,358,018	10,807,297
1872	369,161	11,942,614	12,311,775
1873	244,204	7,523,762	7,767,966
1874	265,535	6,451,701	6,717,236
1875	1,015,863	7,674,303	8,690,166
1876	738,528	7,259,018	7,997,546

⁶⁹ 自「對華貿易法」實施以後，到1949年以前約有250家的美國公司受惠於此法而設立，其間祇有4家公司最後解散或因執照過期而被註銷，可見此一法案實施之成效。詳見美國商務部網站：<http://www.ita.doc.gov/ooms/ChinaTradeActRCS.pdf>，2015/01/10下載。

1877	1,138,136	7,951,203	9,089,339
1878	2,253,148	6,576,125	8,829,273
1879	2,541,117	8,984,622	11,525,739
1880	1,204,525	9,119,988	10,324,513
1881	3,300,312	10,229,594	13,529,906
1882	3,276,728	8,420,130	11,696,858
1883	2,708,395	7,351,961	10,060,356
1884	2,418,367	8,279,598	10,697,965
1885	3,315,402	8,297,722	11,613,124
1886	4,647,333	9,685,691	14,333,024
1887	3,398,390	8,915,920	12,314,310
1888	3,145,712	8,962,569	12,108,281
1889	3,805,664	7,084,121	10,889,785
1890	3,676,057	8,164,748	11,840,805
1891	7,731,752	9,033,630	16,765,382
1892	6,061,900	10,784,655	16,846,555
1893	5,443,569	11,725,644	17,169,213
1894	9,263,082	16,442,788	25,705,870
1895	5,093,182	15,383,402	20,476,584
1896	11,929,853	11,123,599	23,053,452
1897	12,440,302	17,828,406	30,268,708
1898	17,163,312	11,986,771	29,150,083
1899	22,288,745	21,685,715	43,974,460

1900	16,724,493	14,751,631	31,476,124
1901	23,529,606	16,572,988	40,102,594
1902	30,138,713	24,940,152	55,078,865
1903	25,871,278	19,528,116	45,399,394
1904	29,180,946	27,087,975	56,268,921
1905	76,916,838	27,030,772	103,947,610
1906	44,436,209	25,671,428	70,107,637
1907	36,903,476	26,597,660	63,501,136
1908	41,245,704	23,824,059	65,069,763
1909	32,606,549	32,446,245	65,052,794
1910	24,799,494	32,288,831	57,088,325
1911	40,822,853	33,965,679	74,788,532
1912	36,197,671	35,049,902	71,247,573
1913	35,427,198	37,650,301	73,077,499
1914	41,231,654	40,213,065	81,444,719
1915	37,043,449	60,579,257	97,622,706
1916	53,823,799	72,080,705	125,904,504
1917	60,960,777	94,786,229	155,747,006
1918	58,686,044	77,134,205	135,820,249
1919	110,236,706	101,118,677	211,355,383
1920	143,198,962	67,111,451	210,310,413
1921	175,789,652	89,541,816	265,331,468
1922	169,004,534	97,579,046	266,583,580

1923	154,447,651	126,803,772	281,251,423
1924	190,056,942	100,754,411	291,711,353
1925	142,513,422	143,153,127	285,666,549
1926	187,647,086	150,113,103	337,760,189
1927	166,793,690	121,752,658	288,546,348
1928	205,541,351	127,204,573	332,745,924

說明：本表單位為海關兩(H. K. Tls.)，標*則為上海銀兩，非海關兩。

資料來源：楊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頁118。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年譜與文獻

《申報》(上海), 1917。

Shen bao (Shanghai), 1917.

《東方雜誌》(上海), 民國四年(1915)-民國七年(1918)。

Dong fang za zhi (Shanghai), Min guo si nian (1915) - min guo qi nian (1918).

American University Men in China, Shanghai: The Comacrib Press, 1936.

Arnold, Julean and Various American Consular Officers. *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Vol. I, II,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917-1918.

Boorman, Howard L.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9.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Ending, Aug. 18, 1916.

Jour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s, Vol. 5, 192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914-1917.

New York Times, 1916.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Ending, April, 1918.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匯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Shanghai she hui ke xue yuan jing ji yan jiu suo, bian. *Ying mei yan gong si zai hua qi ye zi liao hui bian*, di 1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係史料·光緒朝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bian. *Zhong mei guan xi shi liao, Guang xu chao wu*,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68.

國史館重印，《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民國四年(1915)-民國七年(1918)，臺北：國史館史料處，1982。

Guo shi guan, chong yin. *Zhong hua min guo hai guan hua yang mao yi zong ce*, Min guo si nian (1915) - min guo qi nian (1918), Taipei: Guo shi guan shi liao chu, 1982.

楊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4號(南京，1931)。

Yang, Duanliu, Hou Houpei, deng. *Liu shi wu nian lai zhong guo guo ji mao yi tong ji*, Guo l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she hui ke xue yan jiu suo zhuan kan, di 4 hao (Nanjing: 1931).

鳳岡及門弟子謹編，〈民國梁燕孫先生士詒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Feng, Gang, ji men di zi, jin bian. *Min guo Liang Yansun xian sheng shi yi nian pu*,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78.

穆家修等編，〈穆藕初先生年譜(1876-194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Mu, Jiaxiu, deng bian. *Mu Ouchu xian sheng nian pu (1876-1943)*,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6.

(二) 專著

Bramsen, Christopher Bo(白慕申). *Open Doors, Vilhelm Mey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Electric in Chin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Burt, A.R., Powell, J.B. and Crow, Carl eds. *Biographies of Prominent Chinese*, Shanghai: Biographical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25.

Cochran, Sherman & Andrew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ochran, Sherman Gilbert.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Cochran, Sherm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y, Ernest R. & Fairbank, John K. eds.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senberg, Emily S. eds. *A World Connecting, 1870-1945*, Cambridge, Mass.,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丁日初，〈上海近代經濟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Ding, Richu. *Shanghai jin dai jing ji shi*,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 1994.
-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76。
- Zhong guo ke xue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zhong hua min guo shi zu, bian. *Zhong hua min guo shi zi liao cong gao: ren wu zhuan ji*, di 3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6.
- 王垂芳主編，《洋商史，1894-1956》，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 Wang, Chuifang, zhu bian. *Yang shang shi, 1894-1956*, Shanghai: Shanghai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2007.
- 王雲五主持，《重印東方雜誌全部舊刊五十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1976。
- Wang, Yunwu, zhu chi. *Zhong yin dong fang za zhi quan bu jiu kan wu shi juan*,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71-1976.
- 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Bergere, Marie-Claire. *Zhong guo zi chan jie ji de huang jin shi dai*,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1994.
- 吳翎君，《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國，1870-1933》，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 Wu, Lin-chun. *Mei fu shi you gong si zai zhong guo, 1870-1933*, Taipei: Dao xiang chu ban she, 2001.
- 吳翎君，《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 Wu, Lin-chun. *Mei guo da qi ye yu jin dai zhong guo de guo ji hua*,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gong si, 2012.
- 吳翎君，《美國與中國政治》，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 Wu, Lin-chun. *Mei guo yu zhong guo zheng zhi*, Taipei: Dong da tu shu gong si, 1996.
- 李玉，《北洋政府時期企業制度結構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Li, Yu. *Bei yang zheng fu shi qi qi ye zhi du jie gou shi lun*,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1.
- 李新、孫思白主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民國人物傳》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
- Li, Xin, Sun Sibai, zhu bian. *Zhong hua min guo shi zi liao cong gao: min guo ren wu zhuan*, di 2 ju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0.
- 胡光麇，《波逐六十年》，臺北：新聞天地社，1967。
- Hu, Guangpiao. *Po zhu liu shi nian*, Taipei: Xin wen tian di she, 1967.
- 唐力行，《商人與中國近世社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 Tang, Lixing. *Shang ren yu zhong guo jin shi she hui*,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 shu guan, 1997.
- 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 Xu, Dingxin, Qian Xiaoming. *Shang hai zong shang hui shi, 1902-1929*, Shanghai: Shanghai she hui ke xue yuan chu ban she, 1991.
- 張謇研究中心編，《實業》，《張謇全集》第3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 Zhang Jian yan jiu zhong xin, bian. *Shi ye, Zhang Jian quan ji, di 3 juan*, Nanjing: Jiangsu gu ji chu ban she, 1994.
- 賈中福，《中美商人團體與近代國民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 Jia, Zhongfu. *Zhong mei shang ren tuan ti yu jin dai guo min wai jiao*,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2008.
- 穆湘玥著，《藕初五十自述(下)》，《中國現代自傳叢書》第1輯第10冊，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為據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印行。
- Mu, Xiangyue, zhe. *Ou Chu wu shi zi shu (xia)*, Zhong guo xian dai zi zhuan cong shu, di 1 ji di 10 ce, Taipei: Long wen chu ban she, 1989, wei ju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26 nian ban yin xing.

(三) 論文

- Arnold, Julean. "American Trad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Dec., 1916, 333-335.
- Davis, Frank F. "Broadening Our Chinese Trade,"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March, 1917, 41-43.
- Jenks, Jeremiah W. "China, American Silent Partn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Jan., 1917, 363-367.
- Mou, H. Y.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American University Men in China*, Shanghai: The Comacrib Press, 1936, 119-120.
- Schran, Peter. "The Minor Significance of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50-1931," in Ernest R. May, John K. Fairbank, eds.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37-258.
- Straight, Willard D. "The European War and our Opportunity in Foreign Trade," *Journal of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4, 296-299.
- Wilkins, Mira. "The Impact of Americ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on American-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 1786-1949," in Ernest R May, John K. Fairbank eds.

America's China Trad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59-292.

Wu, Lin-chun. "European Engineers in China and their Business: The Case of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 1901-1941," *Networks and Communication in East Asia and Beyond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6-7 March 2015",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吳翎君，〈司戴德與清末民初中國〉，「辛亥革命暨南臨時政府成立國際學術討論會」，南京：南京大學，2011年10月16-17日，《辛亥革命暨南臨時政府成立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上冊，頁142-155。

Wu, Lin-chun. "Si Dai De yu qing mo min chu zhong guo," Paper presented at Xinhai ge ming ji nan lin shi zheng fu cheng li guo ji xue shu tao lun hui, Nanjing: Nanjing da xue, 2011.10.16-17, *Xinhai ge ming ji nan lin shi zheng fu cheng li guo ji xue shu tao lun hui hui yi lun wen*, shang ce, 142-155.

(四) 網頁

Report of the Meet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nd of the Affiliated Unions Held at Brussels, July 18-28, 1919,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84535/?page=1> (2015/01/01點閱)。

美國商務部網站，"The China Trade Act":

<http://www.ita.doc.gov/ooms/ChinaTradeActRCS.pdf> (2014/12/10下載)。

**Business and Economic Networks at Work in Chin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Case of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Wu, Lin-ch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e outbreak of WWI provided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ere were many business and economic networks at work, such as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na,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Engineer* and so on.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was absolutely the influential one.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he First World War had affecte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role of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in promoting closer link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enterprises and businesses.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how the networking through the interest groups such as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had strengthened the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Keyword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hips,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